

學術論文

安倍政權下的日本戰略轉型與中日
關係發展Japan's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 Relations
under Abe's Regime張玉國 *Yu-Guo Jhang*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Jilin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安倍政權下的日本正在積極地進行國家戰略轉型，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家戰略 4.0 版」。從歷史長波週期看，21 世紀第二個 10 年的日本正處於國力「強—弱」週期性位移的變動期，國家發展「上升—下降」的階段性轉換期。在這樣的轉折期，日本的戰略轉型將對未來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安倍政權的政策看，「戰前思維」和「戰後道路」是日本戰略轉型的基本理念；變位性權力行為和積極型變位戰略，是日本採取的基本戰略。安倍經濟學、安倍安全保障學、安倍外交學，是日本國家戰略轉型的三大政策支柱。安倍的積極型變位戰略，帶有明顯的進攻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的色彩。日本的戰略轉型必將對中國和平崛起帶來衝擊，對中日戰略結構的穩定和地區未來戰略形勢產生深遠影響。

Japan is actively carrying ou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Abe Regime, which is the “Japan's national strategy 4.0 version” since the Meiji Restoration. As the historical long-wave cycle, Japan is in the “strong-weak” periodic displacement change of the national power in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n this transition period,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has the decisive influence for the future. In the view of the policy for the Abe Regime, “the thinking before the war” and “the road after the war” are the basic conception of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ower behavior and the positive type displacement strategy, are the basic strategy which Japan assumed. The Abenomics, the Abe security doctrine, and the Abe diplomacy doctrine, are the three policy pillars of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The positive type displacement strategy of Abe, involves the color of the obvious offensive realism and opportunism.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Japan must has the impact for China's peaceful rise, has the profound impact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China-Japanese strategic structure and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of future in the region.

關鍵字：安倍政權、戰略轉型、歷史週期、積極型變位戰略、中日關係

Keywords: the Abe regime,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the historical periodic, the positive type displacement strategy, the China-Japan re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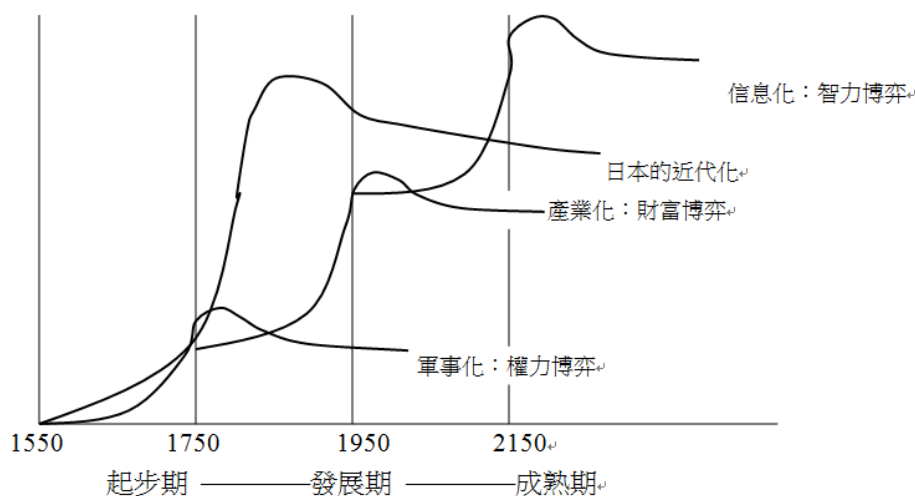
21 世紀的日本正步入新的戰略轉型期。冷戰後的日本每 10 年都有都有一個大變化：20 世紀最後的一個 10 年，日本基本完成了是堅持「一國和平主義」還是向「普通國家」轉向的國內論爭，「普通國家」成為日本政治發展的基本方向；21 世紀的第一個 10 年，在日本政治改造論、經濟結構改革論、東亞共同體論下的「普通國家」實踐進入試錯階段，應將目標指向「大國」還是「中等國家」成為焦點，「普通國家」論事實上向「國家普通」論傾斜，日本自身的再崛起成為戰略轉型的核心理念；進入 21 世紀第二個 10 年，「普通國家」論逐漸演變成「平成開國」論、「強大日本」論，富國強兵、修憲強軍的「大日本論」成為戰略轉型的基本方向。在 20 多年的戰略摸索中，日本事實上沿著「開國—富國—強國」的軌跡進行著戰略爭論和戰略轉型嘗試。由此看來，安倍現政權下的「積極和平主義」是對「一國和平主義」改造的「第三波」。從歷史長波週期來說，這是明治維新下的日本「圖強」、戰敗（二戰）後日本「示弱」、冷戰後日本「思困」和新世紀初日本「重塑」以來的日本國家戰略的「4.0 版」。此次戰略轉型能否成功、以及其將對日本以及東亞帶來何種影響，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壹、日本國家戰略轉型的歷史與歷史週期

從歷史長波週期看，日本國家的戰略轉型呈現出階段性變遷的軌跡。在日本學界，存在 30 年週期、40 年週期、60 年週期、80 年週期的爭論。從資本主義國家「60-70 年週期」說來看，普遍認為「60、80 年週期」說更能體現日本國家戰略長期的演變。「60 年代週期」說重點從經濟與國家發展的角度審視國家戰略變遷，認為日本每 60 年就有一個「上升—下降」的週期性演進。其中，每 30 年中，都有 10 年的起步期、10 年變革期和 10 年的轉換期。也就是說，日本每 60 年會有一個大變化、30 年一個小變化、10

年一個大變革。根據「60年週期」說，在日本150多年的近代化歷程中，「整個日本的戰略是以趕超西歐現代化為主要特徵的。」¹按照西歐國家近代化的軌跡（參照下圖），日本國家的進化一直以「追趕」和「超越」西方的為基本取向，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用近6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歐近200年才完成的社會變遷過程。

圖：西歐國家近代化的軌跡



按照「60年週期」說，在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發展經歷了兩個近30年的上升期：1880年代中期至20世紀初（大體1880-1910）年的「富國強兵」期；194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1945-75）的「戰後高速增長」期。同樣，在這兩個上升期後，緊接著是兩個同樣近30年的泡沫期、混亂、低迷的時期，也即下降期：1915-45年作為世界強國的日本向世界擴張進而走向戰敗的時期；1970年代以後日本步入低速增長進而泡沫經濟崩潰，國家與社會動盪與混亂的時期。按照60年週期說，日本國家發展的

¹ 公文俊平，〈e-Japan 戰略的歷史的意義〉，《Hyper Flash》，Vol. 25(2002)，頁 2-3。

歷史性下降的穀底將是在 2005 年左右，此後日本又將步入一個新的上升階段。以此推論，2005-15 年應該是日本新 30 年上升週期的起步期，也是一個戰略佈局期間。2015 年以後的 10 年應是一個大的發展期，2025-35 年日本將迎來真正的戰略轉型。照此判斷，安倍現政權正處於佈局和發展期的關鍵性位置。從種種動向看，日本的大轉型週期和安倍政權進行的「小轉型」可以部分印證日本的轉變。

按照「80 年週期」說，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國家戰略，明顯地呈現出 40 年一個變動，80 年一個週期的現象。迄今為止，日本國家的發展經歷了 2 個週期的 4 個發展階段：第 1 個週期是 1865-1945 年的戰前週期；第 2 個週期是從 1945-2025 年的戰後週期（參照下圖）。每個週期的大約是 80 年，都包含各 40 年的 2 個階段。也就是說，總體體現為 80 年日本大變化、40 年日本大變動、20 年大變革的基本態勢。

	第 1 週期 (1865—1945)		第 2 週期 (1945—2025)	
軌跡	開國·富國強兵—軍事對外擴張—戰敗		復興·高速增長—經濟大國—經濟對外擴張—經濟空心化·再生——？	
階段	第 1 階段 (1865—1905)	第 2 階段 (1905—1945)	第 1 階段 (1945—1985)	第 2 階段 (1985—2025)
特徵	上升期	下降期	上升期	下降期
事件	明治維新 日俄戰爭	大東亞共榮圈 (1923 年東京大地震) 太平洋戰爭	結束美國佔領 “日本奇跡”	廣場協議 (1985) 55 年體制崩潰 (1993) (2011 年 東北大地震)
位置	擺脫不平等條約 成為世界軍事國	對外侵略； 戰敗投降 置於美國佔領下	60 年代成長為世界 第三經濟大國； 80 年代成為世界第 二經濟大國	失去的 10、20 年； 2010 年下降為第三 經濟大國；IMD 國 際競爭力由 1992 年的第 1 位下降至 2012 年的第 27 位
走勢	弱——強	強——弱	弱——強	強——弱

按照「80 年週期」說，1985-2025 年的日本處於下降期，2025 年才將

是日本重新從谷底走向復興的轉折。以此推論，日本儘管已經走過了「失去的 10 年」、「失去的 20 年」，還必將在「失去的 30 年後」才可以真正走出低谷。據此來說，安倍現政權的「日本復興戰略」、致力在 2024 年完成修改憲法的努力等，都將是下降末期的日本謀求谷底強勢反彈的政策。

綜合兩種戰略週期學說判斷，如果按照 10 年一個變化，20 年一個小調整，30 年一個大變革，40 年一個大轉向的複合軌跡衡量，可做出以下幾個判斷：（一）1990 年代以來，日本進入了一個比較大的變革期，是日本強弱、盛衰轉換的波動期；（二）安倍政權下的日本戰略轉型，將是在此前 20 年的變革的基礎上，對日本進行的更大範圍、更大幅度的調整；（三）安倍政權本身，正處於日本國家興衰週期性轉換、發展階段「上升—下降」週期性變動的微妙時期；（四）在這樣的轉換期內，從經濟和社會發展視角看，不排除日本復活經濟和提升日本綜合國力的可能；（五）從歷史和政治多視角看，這一階段將是日本政治意識大變遷和戰略意識大變化的時期，也將是左右後 10 年日本戰略興衰的關鍵時期。

貳、安倍的戰略轉型理念：「戰前思維」和「戰後道路」

安倍政權目前推動的日本戰略轉型，是綜合考量日本戰略變遷的一個縮影。

從戰略思維來說，安倍秉持的不是「冷戰思維」，也不是「戰後思維」，而是「戰前思維」。他的基本邏輯是：戰後的日本不正常，戰前的日本才正常；戰後日本在「適應體制束縛」下生存，戰前日本在「改變束縛體制」下強大；因而，要擺脫日本戰略困境，其關鍵是要擺脫「改造日本」的「戰後慣性」，使日本在類似於戰前那樣的「改造世界」中獲得動力。由此，集戰後「日本奇跡」之成就，融戰前「趕超戰略」之「活力」；內改戰後體制，外脫戰後體系；拋棄日本國憲法這身「舊衣」，摘下戰敗國這頂「帽子」，打造一個「日本帝國」式的「強大日本」，是安倍的「大日本夢」。

從戰略模式來說，安倍骨子裡也並不希望走「戰前道路」（武力擴張道路）仍主張堅持「戰後發展道路」（經濟大國道路）。不過，他認為冷戰式的「經濟大國道路」已經時過境遷，日本需要汲取戰前「自主圖強」與戰後「依強謀富」經驗，重新確立謀求財富和權力的「獲勝戰略」，尋回日本的國際威望。由此，安倍政權下的新「富國強兵」政策旨在摸索一種集戰前與戰後兩種方式合理性的「強國之路」；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本質上改變戰後「重依賴、輕自主」的權力獲取方式，在「依賴」與「自主」之間建立新平衡；安倍的「美麗日本」論，就是要打破戰前與戰後日本歷史的「兩分論」的枷鎖，在歷史的「繼承」和「斷裂」之間構建起新統一的歷史論和戰略論，為「日本道路」的戰略設計開山鋪路。

可以說，「戰前思維」和「戰後道路」及其結合，是日本戰略轉型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路線。安倍戰略思想是其家族政治基因、個人偶像崇拜和自身執政陰影三種因素直接催生的產物。安倍既想當現時代的吉田茂、池田勇人，再創「日本戰後奇跡」；也想當現時代岸信介、中曾根康弘，做日本「自主道路」的「引路人」；更想當「日本的邱吉爾」，秉持不拘一格的「道理在我，勇往直前」的理念，做一個「影響歷史的偉人」。因此，「戰前思維」和「戰後道路」是安倍積極推動日本戰略轉型的理念基礎。在這種理念中，既有戰前的「大日本主義」思想，也有戰後的「小日本主義」的印記；既有基於日本歷史觀的「做大圖強」的日本夢，也有基於對世界歷史認識的「救世主」式的偏執。

總體上看，安倍的日本戰略轉型理念體現著對歷史、時代、日本道路及日本與世界關係的深層思考，反映著其基本的認知和態度。這主要體現為：

第一，如何看歷史？在安倍看來，戰後的日本歷史就是戰敗史、「被虐」的歷史。思考日本的未來道路，要思考「千百年來的日本歷史」。也就是，思考日本的「大歷史」和「大日本」的歷史。由此，對歷史問題予

以重新定位。

第二，如何看時代？安倍強調時代的領袖不能被「歷史潮流」所束縛，要有對時代有「獨到」的認識。也就是說，叢林法則、弱肉強食仍是時代的本質。應該在質疑和超越時代意識的基礎，從國家本性評判時代。安倍強將中日關係同一戰前的英德關係相類比，乃至暗示「中日必有一戰」等，都明顯刻有中日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對自身和時代認識的印跡。與此同時，「世界無秩序」或「無極時代」的時代認知，也使得安倍將仿效明治時的「富國強兵」作為日本生存的保險戰略。

第三，如何看日本的道路？安倍認為，戰後的日本並沒有實現完全獨立，要實現富國強兵的「強大日本」目標，首先是日本的獨立。其與戰前福澤諭吉「一身獨立，一國獨立」的獨立思想一脈相承，也與戰前「脫亞入歐」式的日本獨立思想極其相似。修改憲法和富國強兵等，都這種「獨立」思想的真實體現。不過，從安倍的「強日本論」看，獨立的目標還在於強大。戰前的「富國強兵」、戰後的「日本奇跡」，都是日本的「強盛之道」。日本需要在獲取權力和財富的道路上，尋找到二者兼得的、且有益於提升日本國際威望的新方法。

第四，如何看日本與世界的關係？要對戰後秩序、日本侵略等問題置於世界歷史中予以重新定位。安倍強調的「憲法並非日本製造」、「侵略沒有國際定義」，以及「聯合國徒有其表」等，更類似於戰前日本對國聯、對國家關係的基本認識，都暗含有對戰後國際正義和國家道義的否定。與此同時，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重新塑造規則和秩序，也是安倍在國際上大談「積極的和平主義」、指涉「中國威脅」背後的真正意圖。

第五，如何看實現國家目標的目的和手段？安倍的「富國強兵」實質上是「強兵富國」。強兵能富國、富國需強兵，這就是安倍經濟學邏輯背後的政治邏輯。制定武器裝備轉移三原則、解除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限制等，都是將軍事和軍工產業作為日本復興保障和支撐的具體體現。修改和平憲法，實質就是讓日本在實現國家目標過程中理論上能夠運用軍事手

段；日本所謂的「普通國家」，實質就是能用或可以用各種手段實現國家目標的國家。在他看來，能夠如此，日本才是一個「正常國家」。

總而言之，現階段的日本戰略轉型目標已經明確建立在「大而強的日本」，而否定「小而弱的日本」，還不屬於戰後「乘便車的日本」、「商業現實主義的日本」，謀求建立依賴而不依附、獨立自主且隨強而動的富有戰略的日本。這種轉型既是建立在安倍對日本歷史「持續而審慎地認識與思考」²基礎上的，也是建立在日本對當今國際體系和秩序變革預期的戰略認識基礎上的、一種「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的真實體現。

參、安倍的轉型戰略：「積極型變位戰略」

對於安倍政權下的日本戰略轉型，有兩個相互衝突的認識：一種是從日本政治的微觀視角看，認為日本政治轉型「在 20 年前就已經進入了過渡期，但至今仍在過渡期徘徊」³，日本仍處於一個戰略轉型的爭論期，處於戰略困局而無法自拔；另一種認識是，從 21 世紀以來的日本行為看，日本已經從戰後的「和平國家」向「普通國家」大幅度轉向，乃至日本有復活軍國主義危險。日本並非原地踏步，絕非 1990 年代那個轉變的「太小、太慢」（海灣戰爭時的美國評價）的日本，已是一個轉變得「太快、太大」的日本。兩種相互矛盾和衝突的認識，勾勒了一個現實的日本戰略困境：在自身看來，其轉變相對於期待而言始終是望塵莫及；在他人看來，其轉變已經是猶過之而無不及。也正因如此，日本的變動總會引發周邊國家以及大國的敏感反應，日本的戰略轉型總給人以諸多的不確定性。

安倍政權的日本轉型戰略，可將之稱為「積極型變位戰略」⁴。安倍的

² 安倍晉三，《致美麗的國家》（東京：文藝春秋出版社，2006 年第五版），頁 26-27。

³ 卡迪斯，〈日本政治走向何方〉，《日本言論 NPO》，2011 年 6 月 17 日。

⁴ 張玉國，〈積極型變位戰略：安倍政治與日本的戰略轉型〉，《東北亞論壇》，2014 年第 3 期，頁 54-56。

戰略行為可稱為「變位權力行為」⁵。其核心是：改變戰前、戰後歷史的「兩分論」，重新定位日本的「歷史遺產」，建立日本的統一歷史觀；變革戰後體制下的安全與經濟發展的「分離論」，以「一身獨立，一國獨立」為核心，改變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改變日本「經濟一流，政治三流」的「兩極狀態」，尋求以「普通國家」為核心的政治與經濟、軍事與安全、依賴與自主的平衡發展戰略；打破「大日本主義」與「小日本主義」之爭的「非大即小」的戰略魔咒，以「積極的和平主義」重塑戰略共識。這種「積極型變位戰略」的兩個基本方向是：在內，重構日本政治框架，建立長期穩定政權結構，打造像「55 體制」那樣的「2013 體制」；對外，重新認識國際體系轉變，重塑外在威脅，構建像「戰後自由貿易體制」那樣的有利於日本發展的秩序與規範。

該戰略的戰略重心是，重新獲取日本在東亞的戰略優勢，恢復日本的世界影響力，類似於戰後「歐洲安排」——「美國進來、德國趴下、俄羅斯（蘇聯）出去」那樣，重新進行新階段的「亞洲安排」——美國重返、日本再興、中國低頭。該戰略的政策路徑是：以「安倍經濟學」為核心，對日本經濟下的一劑「猛藥」，改變日本增長模式；以「安倍安全保障學」為核心，解禁和打破憲法制約，重構日本安全的法制和制度框架，獲取和充實綜合保障日本安全的工具和手段；以「安倍外交學」為核心，構建民主國家聯合體和自由與繁榮之弧安全帶兩個戰略支撐，以「中國威脅」為標的重構地緣政治格局。

安倍主導下的日本戰略具有明顯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色彩。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認為：「所有國家都追求權力最大化，體系中不會有維持現狀的

⁵ 「變位權力行為（meta power behavior）」是與「聯繫性權力行為（relational power behavior）」相對的政治行為概念，後者是指在給定的機制結構內尋求價值最大化的努力；前者是改變機制本身的努力。聯繫性權力是認可現存的目標和機制結構，他只要求有效地追求這些目標；變位元權力行為則拒絕現有目標和機制結構，利用各種正規、理性的計算追求新的目標和結構。斯蒂芬·D·克萊斯勒，《結構衝突：第三世界對抗全球自由主義》（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0-13。

國家。」⁶由此，面對大國的崛起，「受威脅的國家常常會採用推卸責任而不是均勢戰略……推卸責任者可避免與侵略者打鬥的代價。」⁷安倍的積極型變位戰略，就是建立對自身實力相對下降、國際權力向新興國家轉移以及中國崛起的基本認識上的，一種日本積極應對而非被動反應的戰略。對於中國的崛起，日本衰落的現實，該戰略明確將「捆綁美國」和「推卸責任」作為主要的應對方法。對美國東亞再平衡戰略的支持，可以說是日本綁定美國，通過美國制衡中國的主要政策。安倍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在歷史問題上的修正主義態度以及參拜靖國神社等，也旨在於促使美國對東亞的深度介入、對中國不斷增長的權勢予以制衡，同時也帶有向美國推卸責任的目的。美國對此表示「失望」，是因為美國也有充分發揮盟國作用彌補美國實力衰退的想法，但美國並不希望日本「拖美國下水」。但兩國的戰略也有明確的契合點，那就是大幅度提升日本的作用，強化日美同盟的功能，打破日本憲法的限制，擴展日本的軍事貢獻。

安倍戰略也具有明顯的機會主義色彩。與冷戰時期的「商業機會主義」不同，安倍的戰略更帶有「國家機會主義」的特徵。從日本國家戰略週期看，日本出於「上升—下降」的關鍵期；從國際權力轉移來看，中國崛起和美國的衰落使得兩個世界大國處於是共治還是衝突的微妙時期；從世界經濟的長波週期看，整個世界國家權勢也將在 2017-25 年迎來一個大變動週期。⁸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安倍政權自身又恰好處於一個沒有主要抗衡勢力的「黃金期」。因此，安倍的積極型變位戰略旨在利用這樣的戰略

⁶ 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46-47。

⁷ 王義桅、唐小松，〈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作——評米爾夏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美國研究》，第 4 期（2002 年），頁 129。

⁸ 按照國內外學者對世界經濟長波週期的研究，有人認為 2017 年世界經濟將迎來新週期，也有人認為 2025 年前後將迎來大的週期性變動，屆時國家權勢將發生大的位移。在此之前，對於各國來說，都是一個戰略調整期或「戰略機遇期」。目前，世界各國都普遍認為，如何利用好這個戰略機遇期，對於國都至關重要。安倍的戰略，說到底，也是日本利用戰略機遇期的政策。

機遇，使日本重新回歸世界政治的中心。2013年以來，安倍在內政上，以打造長期政權為核心，⁹從「risk off（規避風險）」轉向「risk on（無畏風險）」，不斷對戰後政策進行修正；在外交上，開展首腦外交，兜售「中國威脅」，為其歷史認識和立場「正名」，並旨在建立一個價值觀聯盟。這些政策既是安倍實用主義的體現，也是其機會主義的體現。

總而言之，安倍推動的日本國家戰略轉型，是對戰前日本的再思考、對戰後體制的再認識、對未來日本的再定位。較之冷戰後歷屆政權來說，這是擺脫「狹隘日本論」，在對戰前、戰後的歷史和戰略再定位的基礎上，進行大戰略設計的一個嘗試。安倍本人是一個「強硬的國粹主義者」和「歷史修正主義者」，¹⁰他的轉型戰略也必將對東亞和世界帶來諸多的戰略衝擊。

肆、中日關係的未來戰略形勢

日本的戰略轉型將對未來中日關係造成深遠影響。中國的崛起，現已成為日本戰略構築的一個主要前提。「對沖」中國、制衡中國，事實上已成為日本戰略的一個基本方向。中日國力地位的變動、戰略結構的轉變、世界影響力的消長，對日本造成了極大的戰略衝擊。反之，日本的戰略轉型、歷史問題的翻案、以及總體右傾化的態勢，也對中國及中日關係構成巨大的衝擊。「兩強並立」時代的中日關係發展，既需要戰略定力，也需要戰略魄力。

面對這樣的安倍、這樣的日本來思考中日關係，實質是五個問題：如何看中國、如何看日本、如何看合作、如何看分歧、如何看「第三因素」。這其中，關鍵是中國拋棄「消極反應型」應對方式，積極主動設計中日關係；

⁹ 週刊ポスト，〈安倍長期政權 10年計畫 再々登板もあるリアルな工程表を入手〉，2013年5月24日號，<http://getnews.jp/archives/337304>。

¹⁰ 東京新聞，〈首相歷史認識 米が懸念〉，2013年5月9日。

首要是針對安倍的戰略外交行為，看清安倍的戰略設計；核心是短期需要針對安倍和安倍政權、中期是針對日本國家戰略轉型、長期是針對日本國家發展道路和模式的變化。有鑑於此，針對當前形勢，可以大致做以下幾個判斷：

第一，未來中日關係的關鍵在中國。日本今後仍會頻繁挑起事端，中國的「刺激—反應」型應對不會收效，反受其累。應轉變為「結構—行動」型應對，從總體標明對日政策和對策的結構位置。

第二、安倍和安倍政權不是個案，日本的戰略轉型是大方向、日本型發展模式接近戰前的現實主義，但還未發展到軍國主義的程度。安倍政權式的日本行為方式今後還會有，拋棄理想的和平主義而轉為積極的現實主義是戰略轉型的根本，恢復戰後的「強日本」，讓中美等大國接受這樣的「轉型的日本」是日本的戰略訴求。

第三、中日之間合作還是衝突的問題，受一種可稱之為「結構性戰略意識」所左右。中國以「正向型」的戰略結構意識為主導，認為合作將為雙方帶來更多收益，衝突必然損害彼此的利益。由此，將中日關係看作是影響中國崛起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認為中日關係不好會對其他關係造成負影響。日本則以「反向型」的戰略結構意識為主導，認為合作不但會強化中國影響，而且會引發美國憂慮，日本則「兩面受氣」；衝突會提升日本需求的政治、安全上的影響力，藉美國和中國鄰國之力，提升日本的影響。由此，它深知中國希求中日合作，所以一定程度的合作是日本的需求，一定程度的緊張也是日本的需求，以應對中國崛起為核心的「兩面下注」策略來擴展日本的戰略空間。

第四、美國是中日關係中的「關鍵協力廠商」。對於當前的美國來說，中國「太大」且變得更「大」，日本「太小」且變得更「小」。中國國家大，且變得更強大；日本國家小，且日本的歷史認識讓它變得更矮小。但美國戰略性的矛盾在於：解決東亞大問題時，更依仗「小日本」；而解決小問題

時，更希求於「大中國」。因此，美國迷茫之處在於：日本解決大問題太小，中國解決小問題太大。總體上，美國希望的最好局面是：中日親而不合，都以不同角色融入在美國體系之中。美國最不希望的局面是：中日一體，聯合對抗美國。在這兩種局面之間，美國希望中日「鬥而不僵、僵而不破、破而不戰」。

責任編輯：林正斌